

论我国图书馆界对抗战事业之贡献

倪德茂

摘要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国图书馆界尽管面临经费缺乏、职员被裁减、房舍被强占轰炸、图书被抢劫损毁等诸多困难,但仍在政府领导和有识之士号召之下,毅然地担当起支援抗战之责任;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唤起民众投身抗日;揭露日军暴行,争取国际同情;实施战地图书服务,提供精神食粮;开展民众教育,提高抗战与自救能力;抢救珍贵图书,保存中华文化;募集钱物,支援前线,为最终战胜日军作出了贡献。参考文献 57。

关键词 图书馆史 图书馆界 抗日战争 贡献

Contributions of the Library World to China's War Effort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to Japan

Ni Demao

Abstrac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to Japan, China's library world confronted such difficulties as funding shortage, reductions in personnel, enemy occupation and bombing of houses, enemy theft of books, and other damages. However,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government and an appeal to the library world by representatives, the library world unflinchingly took up the responsibility of supporting the war effort. They developed propaganda for saving China and aroused people to resisting Japan's army, exposed Japanese atrocities and strove for international sympathy, provided book-lending services and offered pabulum for army, carried public education to improve people's abilities of resistance to Japan and save themselves, salvaged rare and precious books from occupied territories to preserve Chinese culture, raised fund and materials to support the front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defeating the Japanese army ultimately. 57 refs.

Keywords: Library History; Library World; War of Resistance to Japan; Contribution

1 引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人民陷入了长达十四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不仅是中国军队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责任。对抗战而言,“图书者,即其重要工具之一;而图书馆者又即此工具之大本营”^[1]。但是,目前学界尚无专门论述我国图书馆界对抗战事业之贡献的研究成果,只是在部分研究成果中对个别图书馆在抗战事业上的贡献有所提及,且这类研究的成果多侧重于图书馆在抗战期间如何抢救图书、宣传抗战、开展民众认字教育等方面,如:《八年抗战中的江西省图书馆》^[2]一文涉及江西省图书馆开展抗日宣传、开展识字运动等内容;《抗战初

期湖南的救亡图书室》^[3]论述抗战初期湖南省设置救亡图书室,并于救亡图书室内陈列抗战相关书报,以宣传抗战;《抗日战争与图书馆》^[4]提及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等在抗战期间宣传抗日事宜;《同志有心齐戮力 指掌满溢是书香——文献保存同志会史事考述》^[5]和《文献保存同志会与“孤岛”古籍抢救》^[6]两文论述了郑振铎、蒋复璁等人组织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旨在帮助国立中央图书馆在上海沦陷区抢救珍稀图书。本文拟专门探讨我国图书馆界如何在南京国民政府、各地管理部门以及图书馆界有识之士的管理与引导下,克服困难,为抗战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更全面地论述图书馆界在抗战事业中的贡献。

图书馆界奉献抗战事业是在自身面临诸多困难的情形下做出的决定。抗战期间,各图书馆普遍面临图书购买渠道狭窄、经费缺乏、工作人员被裁减等困难:上海、武汉失陷后,滇越铁路中断,致使内地图书馆订购图书困难,滇缅路被日军截断后,图书馆无法向国外订购图书^[7];由于物价高涨,四川省立图书馆经费困难,其全年之购书费“尚不足八份日报之开支”^[8];由于经费困难,1943年8月,重庆市立图书馆被迫一次性裁减员工5名,留职人员仅8人,被裁减人员占员工总数的38%^[9]。除面临购书、经费、裁员等困难外,图书馆还得忍受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沦陷区图书馆更面临馆舍被敌人强占,图书被敌人掠夺、损毁之风险。如:1938年4月10日,国立湖南大学图书馆被敌机炸毁^[10];1938年6月,敌伪多次到北平松坡图书馆搜查,“态度强横,随手撕毁书籍,并当场焚烧图书,又携走书报刊物”^[11];1942年,敌人强占国立北平图书馆的馆舍、图书^[12];南京沦陷后,敌人在南京抢走图书七十余万册^[13];……据不完全统计,仅截止到1938年,我国就损失图书馆2166所,图书损失高达8,664,000余册^[14]。

2 图书馆界从事抗战工作的管理与引导者

在日军疯狂侵略和中国濒临亡国灭种之际,图书馆界自身虽面临种种困难,但仍肩负起抗日救亡的社会责任,毅然地投入到抗战伟业中。图书馆界能够积极投身抗战事业,应归功于各方力量的管理与引导,具体分述于下:

2.1 南京国民政府

抗战期间,南京国民政府逐步认识到图书馆界在支援抗战中的作用,并出台了相应的法规,引导和管理图书馆界从事抗日救亡工作。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普及全国图书馆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凡未设立图书馆的省、市(行政院直辖市),以及未设立图书馆的县、市(普通市)一律应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内至少设置一所

图书馆,对已经设置图书馆的上述地方行政区应充实图书馆设备;各乡(镇)应于民国三十年内设置书报阅览室一所;国立中央图书馆应设置书报供应站,省、市(行政院直辖市)立图书馆应设置书报供应分站,县、市(普通市)图书馆应设置书报供应支站,以办理图书馆及阅览室书报供应事宜;各级书报供应站应设法提供有关三民主义和抗战救国的书报杂志^[15]。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法规形式明确要求各级图书馆应向民众提供相关抗战书籍,并希望通过普及图书馆教育而达到教育民众、宣传抗战之目的。此外,考虑到当时的实情是各机关团体、各级学校所附属之图书馆拥有丰富的书籍、报纸,其书报藏量甚至远较一般县立图书馆丰富^[16],但这类图书馆仅向其内部人员开放,不向全体市民开放。为充分利用各学校、机关团体图书馆丰富的文献资源,服务全体市民,以利民众动员和抗战宣传,南京国民政府出台了《各级学校及各机关团体附设图书馆(室)供应民众阅览办法》,规定各级学校和各机关团体所设置之图书馆(室)必须向全体民众开放,并要求它们“协助当地乡(镇)、保设置书报阅览室并应介绍或借予书报陈览”^[17]。国家以法令形式强制要求各学校、机关团体图书馆向全体市民开放,并协助所在乡(镇)、保建设书报阅览室,可弥补公共图书馆建设之不足,使普通民众有更多机会阅读抗战书报,这对于动员民众、宣传抗战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2.2 地方管理部门

抗战期间,各地管理部门也纷纷出台相应法规或发布行政命令,以管理、引导本辖区内图书馆界开展抗日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湖北省教育厅令省内各图书馆、民众教育馆,将日本侵略我国沈阳之经过以及田中义一向日本天皇建议侵略中国之“田中奏折”内容向民众广为宣传,以揭露日本侵略中国之罪行。此外,湖北省教育厅还要求各民众教育馆、图书馆按月添购有关日本侵略中国之书籍,用以宣传抗战^[18];浙江省教育厅于1937年出台《战时各级图书馆工作纲要》,要

求“战时各级图书馆工作,以指导民众参加全体动员之准备,从事抵抗敌人侵略,并指导民众应付战时各种之智识为目的”,各级图书馆应“从事广大救国宣传工作,并领导民众作长期抗战之准备”^[19];广西省政府于1942年颁布《广西省中心学校民众图书馆规程》,要求各中心学校均应设置民众图书馆。民众图书馆的工作是发布抗战消息,向民众传授防空、救护、兵役等知识,以及“搜罗有关战事书籍、图表、器物,并向民众宣传”^[20]。

2.3 图书馆人

为引导图书馆界克服困难,服务抗战事业,图书馆界有识之士纷纷献计献策:针对抗战期间图书馆经费困难,无钱订阅报刊宣传抗战之现实,罗亦农建议各图书馆“举行私人报纸公开阅览运动,劝导阅报人家,将其阅过报纸公之大众,以传达中央政令,播送抗战消息”^[21];为便于宣传抗战,毛坤建议各图书馆将关于抗战的各种书籍,收集成抗战文库,供给前、后方的人阅览,并建议将图书馆、民众教育馆、博物馆混成一体走下乡去向广大农民作抗日之宣传^[22];为教育群众,提升民众阅读抗战书籍的兴趣,熊洪薇建议将与抗战有关的图书、杂志、漫画、影片以及缴获的敌人文件、千人针、护身符、旗帜等战利品拿到图书馆展览,“以引起他们阅读抗战图书的兴趣,增加他们对敌人的认识,而坚定他们对于抗战必获最后胜利的信心”^[23];竹筠认为,抗战期间图书馆员最急迫的任务是替科学家搜集关于国家建设和国防资源的研究资料,“图书馆员能够替科学家节省一分钟时间和精神,很便利地供给他们所需要的研究参考材料,使他们的研究能够早一分钟成功,也许我们的前线可以少死伤一万人”^[24];为充分利用图书馆为军事机关提供军事研究资料,充分利用图书馆动员民众、宣传抗战,喻友信呼吁政府应加强战时图书馆立法,用法律来规范图书馆在抗战期间的任务^[25]。

总体来看,南京国民政府、地方管理部门、图书馆界有识之士在引导图书馆界从事抗战事业

上各有侧重:国民政府主要是强调广泛建设图书馆和普及图书馆教育,并在此基础上附带要求图书馆向民众提供抗战相关书籍,以宣传抗战;地方管理部门侧重于指导图书馆从事抗战宣传、兵役宣传、开展全民总动员以及向民众传授抗战必备常识等具体事务;图书馆界有识之士更关注如何指导各图书馆高效率地服务抗战事业。

3 图书馆界对抗战之具体贡献

在各方力量的管理与引导下,各图书馆自身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但仍充分利用丰富的馆藏文献资源这一优势,服务于抗战伟业。图书馆界主要为抗战做出了如下贡献:

3.1 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唤起民众投身抗日

日本帝国主义在对华军事侵略的同时,还开动其宣传机器,大肆进行侵略宣传。“日本帝国的宣传有两个目的:首先,通过战时宣传欺骗日本国内民众,使其认为它是亚洲的领导者;其次,通过宣传,使中国人民感觉日本人会帮助他们达到从西方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之目的。”^[26]

为瓦解敌人阴谋,鼓舞我国人民的抗日意志,我国方面对日本的宣传攻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宣传斗争。图书馆界拥有极为丰富的图书文献资源,这决定了它在抗日宣传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动员民众、宣传抗战,是图书馆界服务抗战的重要内容之一。抗战期间,各图书馆因地制宜,灵活运用各种方式进行抗战宣传。例如,江西省立图书馆为了让市民及时了解抗战消息,每日派遣工友乘车往距城七八里远的教育厅无线电指导室接取广播新闻,稍经编辑后,张贴于图书馆门外,供人阅览;此外,还坚持办壁报,“用极通俗的文字,把当前的重要时事加以解说和报道,同时更搜集许多英勇的故事,用旧小说的形式灌注入新的内容,以供民众的阅读”^[27]。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校图书馆收集了各种关于抗日的书籍、图表、杂志等,用以举办抗日宣传周^[28]。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编著《爱国故事》,用以激发国人爱国热情,此外,该馆还倡导成立了“无锡民众励志救国

会”,利用民众励志救国会这一组织制作救国格言牌张贴于各交通要道,并坚持每日出一张壁报,报告重要时事^[29]。为做好抗日宣传工作,和顺图书馆从1931年起,每日坚持誊抄官方电报消息张贴于十字街头,供民众阅览,后又创办《和顺图书馆无线电三日刊》,用以发动群众、宣传抗战^[30]。除上述情形之外,全国更多的图书馆通过创办抗战阅览室,举办抗战图片展、国耻宣传周、国耻日演讲会等形式广泛地进行抗日宣传。图书馆界在我国掀起了一股动员民众、宣传抗战的热潮。

3.2 揭露日军罪行,争取国际同情

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野蛮地入侵中国,屠杀抗日军民,掠夺中国物资;另一方面却欺骗世界,号称入侵中国是为了实现“大东亚共荣”,为其侵略中国之罪行进行辩护。为了让世界爱好和平人士认清日本侵略中国的实质,展示中国军民同仇敌忾的抗战精神,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之同情与援助,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图书馆界掀起了一场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罪行的运动。

1932年,上海图书馆协会、全沪图书馆服务人员联合致函负责调查日本侵略中国问题的国际联盟调查团,控诉日军在我国东北及上海之暴行,揭露日军对中国文化之摧残。该函指出“日军最近之侵略,大炮与飞机向我轰炸之中,敝国生命财产损失极重。东三省及上海一带各大学图书馆之重大损失,殊难估计”,要求“凡此生命财产与图书馆之损失,均应由日本独负责任”,呼吁国际联盟“速取有效方法,制止日本之暴行而维持世界之和平”^[31]。

1937—1938年间,中华图书馆协会通过制作调查表格并分发各图书馆,委托中外人士亲赴各地实地调查访问以及收集新闻报道等形式,调查我国图书馆在抗战中被毁情形,并将调查结果“编撰英文报告,分寄各国,以彰敌人之残暴”。随后,该协会又对中国教育文化机关被日损毁情况进行了调查,撰写成英文调查报告《中国教育

文化机关被毁记实》并出版发行,以便国际社会了解日军对我国教育文化机关所犯下的罪行^[32-34]。

设于瑞士日内瓦的中国国际图书馆在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暴行,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之同情方面也做出了较大贡献。由于该图书馆地处国外,加之驻在地日内瓦为国际化大都市,是国际联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劳工组织等著名国际组织的总部所在地,因此,中国国际图书馆在向外界揭露日本暴行,争取国际同情上较国内图书馆更具优势。中国国际图书馆充分利用这一地域优势,积极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在中国所犯之罪行,展示中国军民不惧强敌,誓死抵御外辱的坚强意志。1938年,该馆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中国自卫”抗战展览会,展出有关中国抗战的照片、漫画、地图、书籍、海外报刊评论等,通过展览物品充分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真实面目和中国沦陷区在日军铁蹄蹂躏下的悲惨状况。“各国民众每日参观者,异常踊跃,因受感动而慷慨解囊捐助者甚多。”^[35]此外,该图书馆还通过联合华侨团体举办以抗战为主题的各类演讲会,放映国产抗战影片,定期举行纪念日典礼,在国外媒体发表反映日军暴行的新闻报道和新闻图片等方式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暴行^[36]。

3.3 实施战地图书服务,为抗日将士提供精神食粮

图书馆向部队提供合适的图书、杂志,不仅能鼓舞士气,提高部队战斗力,同时也可充实将士们的业余生活,为将士们紧张战斗之余的生活带来一丝精神安慰。此外,图书馆提供的一些关于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专业书籍,也是各级指挥官们指挥作战的重要参考资料。当时我国抗战将士的书籍、杂志、报刊等精神食粮极度缺乏,军官不能及时看到新出版的书籍杂志,导致他们对抗战期间国家的政治、经济无从了解,即便是军事类的相关书籍、战报等也感到极端缺乏,至于供给士兵的读物,甚至一点儿没有^[37]。我国有识之士多次呼吁社会各界向抗战官兵提供图书。为此,图书馆界

积极行动,提供战地图书服务,坚持服务前线作战部队与服务后方伤兵医院并重,坚持对官兵的思想政治教育 with 精神安慰并重,提供的图书中专业性强的严肃读物与休闲娱乐类读物并存。1937年,国立中央图书馆在南京各伤兵医院设立流动书橱,每一书橱内放置图书50—100本,外附杂志、画报多种,供官兵阅读^[38];上海市图书馆“搜集文字浅显之各种书籍杂志,分赴后方伤兵医院,借与受伤将士阅读,使得一种身心上之修养与安慰”^[39];江苏流通图书馆为附近所驻之通信兵团设立图书陈列处,将图书馆部分图书陈列于部队,供官兵阅读,并每月更换陈列图书一次^[40];自“八·一三”淞沪抗战之后,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将学生巡回文库之活动范围“由一般商店、住户而移至伤兵医院,工作较平时尤为积极,颇蒙当局好评”^[41]。实践证明,向受伤官兵提供图书服务,不仅能抚慰伤兵心灵,更能激励伤兵的抗战意志。

3.4 开展民众教育,提高国民抗战与自救能力

抗日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军队之间的战争,更是两国经济、科技、文化等综合国力的竞争。据统计,抗战前中国文盲在人口中所占比例高达80%,而日本文盲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仅为0.94%^[42]。如何迅速地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关系到抗战成败。为提升国民文化素质,图书馆界举办了众多的民众学校、识字班、扫盲班、妇女补习班、工人夜校等,鼓励民众免费入学。为方便市民阅读书报,各图书馆在车站、码头、茶馆、酒肆等人员密集之处设立书报阅览点。此外,还组织了巡回文库、巡回图书担,主动将书送到读者手中。北碚民众图书馆因经费困难,连巡回书担也无钱购置,“只好用两个手提篮,选派两位青年工作人员,每天携着书篮,挨户劝人读书”^[43]。由此可知,当时图书馆界开展民众教育之艰难。

除文化教育外,图书馆界还向民众传授防空袭、防毒气、军事常识等抗战期间国民急需了解的知识,以适应抗战需要。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

生举办战时图书展览,“及时展出涉及中日问题、国际问题、军事常识、战时经济、防空防毒设备等内容”^[44];蒙藏学校图书馆将多张《防毒教育图表》张贴于图书馆内,以便学生了解防毒常识^[45];为充实国民国防知识,江苏流通图书馆派员携带大批国防图书和图表到各地开展展览,以资普及^[46];“为求全国人士搜求关于战时各方知识之便利起见”,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编订了《战时国民知识书目》^[47]。图书馆界通过向民众传授抗战必备常识,既提高了民众参与抗战之能力,又增强了民众自我防护之技能,从而有效地减少了民众在敌机空袭中的伤亡人数。

3.5 抢救珍贵图书,保存中华文化

抗战爆发后,我国东南各省的藏书大家因时局混乱,纷纷抛售家藏珍贵图书换取现金,以便举家外逃。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虽然上海及周边地区已经沦陷,但上海租界地区尚未被日军占领,因此社会秩序相对稳定,这使得租界地区成为东南各省重要的图书交易市场。一时间各种珍稀图书汇集其间,各地书商云集于此。日本、伪满、美国依仗其资金雄厚、势力强大之优势,趁机于上海租界大肆抢购我国珍稀图籍。为保存中华文化,避免珍稀图书流入敌伪之手,在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东方图书馆创办人张元济、藏书家叶恭绰会同郑振铎、张寿镛、何炳松、张凤举等人组织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在上海帮助国立中央图书馆抢救珍贵图书。购书经费主要是“利用中英庚款董事会补助中央图书馆的建筑余款一百二十万元和教育部援助的二百万元”^[48]。购书工作由蒋复璁负责主持大局,争取经费,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关部门协调。尽管购书时间短暂,“从二十九年的春天开始,到了三十年的冬初,即‘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即告结束,前后不过两年的工夫”^[49],但是文献保存同志会“所获善本即多达4864部,48,000余册”^[50],浙江和广东一带的著名藏书家,如吴兴张氏适园、刘氏嘉业堂、金陵邓氏群碧楼、番禺沈

氏等故家旧藏珍本图书万余册,均为国立中央图书馆所收购^[51]。

此外,部分图书馆在保护好馆藏图书免遭战火摧残的前提下,还积极帮助各沦陷区图书馆保存、转运图书,如江西省立图书馆规定凡接近沦陷区域的图书、古物,均可请托该馆代为搬运,代为保管,日后仍可由原主领回^[27]。抗战期间,我国图书损失惨重,图书馆界通过开展图书抢救工作,使得部分珍稀图书得以保全,确保中华文化得以继续传承。

3.6 募集钱物,支援前线

图书馆界为抗战筹集钱物,一是指图书馆界向国内、国际社会各界筹集钱物,用以支援抗战;二是指部分图书馆界职员自身为抗战事业捐赠钱物。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通过举办或协助举办各种展览会、游艺会、音乐会等方式为抗战筹款;此外,该馆员工还协助瑞士华侨抗敌后援会采用登报募捐、通信募捐等方式募得巨额现金、大量药品、医疗器械等抗战急需物资,并设法运回国内^[36]。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组织成立“无锡民众励志救国会”,发动会员每日缴纳一定数额之救国基金,并分头向各界劝募“航空救国基金”^[29]。1936年11月16日,国立中央图书馆全体职员捐献一日薪金,用以慰劳绥远抗日将士^[52]。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在日寇侵犯中国上海、十九路军奋勇抵抗之际,规定该校教职员必须将一月工资的十分之一捐助抗战,同时鼓励学生和校工自愿捐款,共捐助资金一百五十余元寄往前方^[53];除此之外,该校还数次为抗战捐款^[54,55]。厦门图书馆从1933年2月份起规定,该馆各职员“每月各扣俸给,贮蓄成数,捐助救国飞机,以御外侮,聊尽国民一份子绵薄义务”^[56]。我国的抗日战争是在国民经济极端凋敝的情形下进行的,政府对前线部队连供应最基本的食物、服装、药品都十分困难。图书馆界与国内其他行业一道为抗战募集钱物,有效地缓解了军队物资供应之紧张,改善了士兵生活待遇,鼓舞了军队士气,为最终战胜日军奠定了基础。

4 结语

在长达14年的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岁月里,“特别是8年全面抗战的艰苦岁月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凝聚起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共同意志,谱写了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壮丽史诗”^[57]。在这场艰苦卓绝的奋战中,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都为赶走日本侵略者贡献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份力量。图书馆界在协助国家抵抗日本侵略方面具有的最大优势在于,各图书馆拥有丰富的图书、杂志、报章、照片、地图、统计图表等文献资源。这些文献资源,既能为前线将士提供充裕的精神食粮,坚定将士“抗战必胜”的信念,也是唤起民众积极投身于抗战事业和揭露日军暴行,争取世界同情的有力工具。抗战期间,图书馆界尽管自身也面临诸多困难,但在南京国民政府、地方管理部门、图书馆界有识之士的管理与引导下,图书馆界充分利用丰富的馆藏图书文献资源,揭露日寇罪行,呼吁民族团结,唤起全民抗战,开展图书服务,实施民众教育……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同时也应指出,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图书馆界在服务抗战中还不能堪称完美。首先,南京国民政府出台的部分法律中尽管有少许内容涉及引导图书馆界服务抗战,但图书馆界所呼吁的战时图书馆立法却始终没有出台,这使得图书馆界在服务抗战事业中缺乏一种权威、专业性的指导纲领,因此,图书馆界在服务抗战中必然存在着一定盲目性。其次,从图书馆界自身来看,各图书馆在服务抗战中还处于各自为政的自发状态,缺少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来协调、指挥各个图书馆的抗日救亡工作,这必然会影响图书馆界服务抗战的效率。为避免各图书馆在服务抗战中缺乏协调,早在1938年,方振武就曾建议,“由政府协助中华图书馆协会,组织全国战时图书馆服务委员会,策动全盘工作,筹划经费,征求图书,训练服务人员,建立与各方面密切的合作关系”^[37]。由于经费困难、人力缺乏的缘故,全国战时图书馆服务

委员会直到抗战胜利也没有组织起来。第三,抗战期间,三民主义青年团、青年远征军读物征募委员会、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等群团组织都曾组织过为前线抗日将士征募图书活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①。图书馆界作为提供图书服务的专业机构,本应在征书慰劳前线将士上有所作为,但是,由于图书馆界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组织发动征书运动,加之各图书馆又饱受经费紧张、人手缺乏等困难,图书馆界在为前线部队征募图书方面鲜有作为。虽然留有些许遗憾,但考虑到其自身的艰难情形,图书馆界为抗战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已属难能可贵。

参考文献

- 1 陈立夫.抗建与图书馆[J].图书月刊,1941(3):1.
- 2 李泉新,陈为民.八年抗战中的江西省图书馆[J].赣图通讯,1986(3):37-40.
- 3 李龙如.抗战初期湖南的救亡图书室[J].图书馆,2005(5):116-117.
- 4 柳青.抗日战争与图书馆[J].情报资料工作,1995(4):36-37.
- 5 刘孝文,刘向红.同志有心齐戮力 指掌满溢是书香——文献保存同志会史事考述[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5(1):116,121-126.
- 6 郑春汛,向群.文献保存同志会与“孤岛”古籍抢救[J].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2009(1):53-56.
- 7 吴晞.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89.
- 8 四川省立图书馆四年半来的概况[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5(1-3):2-5.
- 9 关于民众教育馆及市立图书馆呈报裁撤人员及留职人员名册的呈、指令.附:裁留人员名册[A].重庆市档案馆.档号 0053-0019-01649-0000-163-000.
- 10 国立湖南大学图书馆近况[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9(1):18.
- 11 松坡图书馆损失情形[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6(1-3):12.
- 12 本会第五次年会会员谈话会纪录[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2(5-6):17.
- 13 南京贵重图书七十万册均被敌军劫去[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1):18.
- 14 抗战一年来我国图书馆的损失[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3):21-22.
- 15 教部通令 普及全国图书馆教育暂行办法[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1(3-4):13-14.
- 16 余少文.希望诸不公开的图书馆藏书楼等在可能范围公开阅览以为救济国难时期之一助[J].厦门图书馆声,1936(7-9):2-3.
- 17 各级学校及各机关团体附设图书馆室供应民众阅览办法[J].西康民教季刊,1942(3):28.
- 18 黄建中.训令:厅字第二二二三号[J].湖北教育厅公报,1931(21):3-4.
- 19 战时各级图书馆工作纲要[J].浙江教育,1937(9):158-159.
- 20 王憎蝠.中心学校设置民众图书馆[J].基层建设,1942(18):18.
- 21 罗亦农.图书馆的时代使命[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1(3-4):1-3.
- 22 毛坤.建国教育中之图书馆事业[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9(5):2.
- 23 熊洪薇.抗战期中图书馆应做些什么工作[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2):1-5.
- 24 竹筠.图书馆员与国防总动员[J].中华图书

^① 1939年,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发起为前线官兵征书运动,共征集书报127,494册(三民主义青年团征募书报消息二则[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9(6):21.);1945年,青年远征军读物征募委员会发起为青年远征军征募读物运动,共征集书刊131,612册(征募书刊结束会议记录[A].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860001002050000094);1939年,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总会发起为前方将士征集书报杂志运动,共征集书报26,800余册(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八年工作总报告[M]//张研,孙燕京.民国史料丛刊:政治·军队战争.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56.)。

- 馆协会会报,1937(5):43-44.
- 25 喻友信.战时图书馆立法[J].法学杂志,1939(1):69-71.
- 26 Barak Kushner.The Thought War: Japanese Imperial Propaganda[M].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119.
- 27 李蓉盛.江西省立图书馆的战时工作[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9(6):5-6.
- 28 图书馆举行抗日宣传周[J].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校半月刊,1933(71):55.
- 29 濮秉钧,胡耐秋.民众图书馆实施救国教育之一实例:二十一年度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救国教育工作报告[J].教育与民众,1933(9-10):1713-1726.
- 30 少才.本馆宣传工作概况及对于本乡教育之效率[J].和顺图书馆十周年纪念刊,1939:51-53.
- 31 上海图书馆协会暨全沪围服务人员致国联调查团函[J].中国图书馆声,1932(7):54-55.
- 32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务报告[J].建国教育,1938(1):25-29.
- 33 继续调查全国围被毁状况[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2):17.
- 34 《中国教育文化机关被毁记实》脱稿[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2):17.
- 35 日内瓦我图书馆举行抗战展览会[J].教育通讯,1938(28):9.
- 36 胡天石.中国国际图书馆与抗战[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0(4):3-5.
- 37 方振武.推动战时图书馆服务[J].抗战,1938(70):5-6.
- 38 伤兵医院设有流动书橱[N].中央日报,1937-10-31(03).
- 39 市图书馆举办后方巡回文库[J].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37(28):89.
- 40 私立江苏流通图书馆近讯[J].民众教育通讯,1934(3):17-18.
- 41 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由鄂迁渝后工作概况[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9(5):22-23.
- 42 傅葆琛.世界各国最近文盲统计[J].教育与民众,1930(3):1-6.
- 43 张惠生.一年来的民众图书馆[J].北碚月刊,1937(9-10):113-117.
- 44 刘亮,杨玉麟.抗战时期图书馆学人的救亡思想——以沈祖荣、杜定友、李小缘、刘国钧为例[J].图书馆,2011(5):136-139.
- 45 本校图书馆内悬帖《防毒教育图表》[J].蒙藏学校校刊,1937(23):6.
- 46 苏流通图书馆赴各地展览[N].申报,1936-12-18(08).
- 47 国立中央图书馆近况[N].申报,1940-07-24(08).
- 48 蒋复璁,等,口述;黄克武,编撰.蒋复璁口述回忆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58.
- 49 郑振铎.郑振铎全集:第十七卷[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135.
- 50 卢锦堂.抗战期间中央图书馆抢救我国东南沦陷区散出古籍相关工作报告书之一考察[C]//“国立”台北大学古典文献学研究所.第一届东亚汉文文献整理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北大学古典文献学研究所,2011:134.
- 51 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M].台北:“中国”图书馆学会,1983:123.
- 52 各方对守土将士踊跃输将[N].申报,1936-11-17(04).
- 53 张.慰劳义捐[J].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季刊,1932(1):103.
- 54 两次特别捐款[J].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季刊,1936(4):600.

《国际图联趋势报告》2017 年更新版发布

2017 年 12 月 20 日,国际图联发布《国际图联趋势报告》2017 年更新版,主要提出了三个问题:图书馆如何将革命性的 3D 打印技术融入服务中;图书馆应该如何解决全民教育的迫切需求;网络虚假信息泛滥,图书馆如何发扬自身竞争优势。在报告中,专家们强调了图书馆面临的风险和机遇,鼓励国际图联成员和社会各界人士阅读报告内容并进行思考,探讨图书馆可以做什么或者需要做什么。《国际图联趋势报告》于 2013 年首次发布,旨在使图书馆及相关信息领域充分了解业界专家对图书馆面临的社会、经济、技术发展趋势的看法,探讨这些变化会如何影响图书馆人的生活、工作和制度发展。

资料来源

- 1 IFLA TREND REPORT 2017 UPDATE[EB/OL].[2018-01-15].https://trends.ifla.org/files/trends/assets/documents/ifla_trend_report_2017.pdf.

(国家图书馆研究院 提供)

55 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关于交中国银行重庆分行汇解本校所收全国青年号飞机捐款并请赐给收据的函[A].重庆市档案馆,档号 02870001038710000008000.

56 扣俸捐助飞机救国[J].厦门图书馆声,1933(2):5.

57 习近平.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仪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9-03(02).

(倪德茂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专业 2015 级博士研究生 长江师范学院教师)

收稿日期:2017-06-09